

## 李长之传记体批评中的叙论相间

蔡 青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有其特殊的结构特征, 他在自己传记体批评实践中, 根据时代特征、政治环境的需要, 由事及人, 以人论事, 借古喻今, 发扬了一种叙论相间的文体特色。

**关键词:** 李长之; 传记体批评; 叙论相间

**中图分类号:** I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08) 05-0113-04

### The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Alternation in LI Chang-zhi's Criticism of Biography Characteristics

CAI Qing

(Literature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LI Chang-zhi's biography criticism has spec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period featur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LI Chang-zhi's criticism is from matter to person, drawing support from people to discuss affair, using an analogy between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and developing the literary style of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alternation.

**Key words:** LI Chang-zhi; biography criticism;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alternation

李长之(1910~1978), 山东利津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被人所忽略了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学创作家、文学史家、美学家、翻译家。他的传记体批评专著《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孔子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显现出独树一帜的价值。然而,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至于人们对他的了解甚微。国内外的学者对他的研究也不多, 目前关于李长之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温儒敏、许道明、王富仁、郜元宝、张蕴艳等为数不多的几位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史研究学者的论著中。本文旨在总结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特色, 通过对李长之传记批评一系列作品的仔细研究和分析, 探索李长之传记批评的结构形式中的叙论相间。这种尝试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记文学的历史意义、文

学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目前, 海内外学者对李长之的研究不多, 都是一些比较零散的论著和文章, 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所以, 今天来研究李长之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角, 以便于我们从多角度多方位地去深入了解李长之, 填补我们在研究李长之批评文体中的遗漏和不足。此外站在今天, 我们重读李长之的作品, 发现他的文学观、美学观和批评观对于我们很有启示, 既可以充实我们对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延续性, 也为我们看待现在的文化现象开启了一扇窗口。

#### 一、李长之对叙论相间的结构形式的继承

中国古代传记自司马迁、班固开一代先河之后, “于叙事中寓论断”和文末“太史公曰”“论”“赞”等画龙点睛的评点方式, 一直是传记

收稿日期: 2008-10-22    修回日期: 2008-11-26

作者简介: 蔡青(1983-), 女, 湖北宜昌人, 在读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创作的传统和结构模式,影响着近两千年的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李长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发展了这一结构形式。他的传记体批评都根据时代特征、政治环境的需要,由事及人,以人论事,借古喻今,发扬了这种叙论相间的文体特色。在具体的结构形式上,有开头“第一节”“叙论”“发端”的提纲挈领,言词犀利的论述;有文末“结语”总括全文,耐人寻味的深思;也有文中夹叙夹议,言简意赅的点睛之笔;加上传记中富有情感的叙事写景,描情状物,使得他的传记批评,既生动又有强烈的政论性。

在《孔子的故事》一书中,李长之开头写了“引子”,简单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对孔子进行了总括评价,提出“孔子不仅是个教育家,还是个思想家。”<sup>[5]</sup>这本小书一共有二十九章,前两章写了“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以及“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第三章和第四章就展开评论,告诉我们孔子如何“在挫折中前进”和他“教育事业的开端”。接下来又开始描述孔子的生平道路,到第八章进行评论,即“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和影响”。然后继续叙述孔子从教、从政以及他辗转鲁国、卫国、晋国、宋国、陈国,最后回到鲁国的经历。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后记”中,李长之对孔子做出了评价,用李长之自己的话说是“对孔子的看法”。可见,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在结构上采用了叙论相间的形式。

在《鲁迅批判》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构形式的运用。李长之在这本书中也写了开头的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和结尾的后记,中间一边叙述鲁迅的生活及精神阶段,一边评论鲁迅的文学作品。在对鲁迅作品进行分析后得出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这是典型的叙论相间在结构上的体现。

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仍然以导论开篇,对诗人李白展开了全面研究,列举了李白的政治生活、思想趣向、文学创作。其中很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并且做了专题的阐发。比如用两章的文字勾勒了李白的求仙学道及与道教思想的密切关系,并专章探析谢朓与李白间的诗学脉络,都是以往语焉不详而后来学者乐道的话题。全书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叙论相间的结构模式,使这部作品兼赋激情与才情,展示了作者心

灵与诗人生命交会的结晶。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李长之传记体批评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本书共有九个章节,中间自然地穿插了叙述和议论,使得这部传记体批评浑然一体。李长之用他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精审详核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讨论了他和孔子在精神上和性格上的契合共鸣及距离,论述了司马迁的经历及这一切对他作品的影响,推测了《史记》各篇著作的先后,认为司马迁的人格与《史记》的风格是一事,即浪漫的自然主义精神。李长之对《史记》一书的美学风格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研究司马迁及《史记》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在这部书中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并提出了启人思考的深刻见解。比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自王静安和梁任公提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后,几乎已成定论,李长之却在本书中提出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的说法。这种批评精神体现在本书的议论之中。

《韩愈》这本书在李长之自己的眼中并不是很成功,但这本书也不例外采取了叙论相间的结构形式。本书开头仍然是导言,接下来叙述了韩愈的籍贯和先世,家族的亲戚,他的游学京师,考场失败,就做出韩愈在“挣扎”的心理推测。后来讲到了韩愈初入仕途,阳山被贬的遭遇,其中穿插了他著书写作的历程。

另外一部被大家忽略的李长之的传记批评是《陶渊明论传》,其实这部作品也不出色,但是结构上采用的依然是叙论相间的形式。开头也是模式化的序,介绍了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接着写了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最后列出专门的评论来说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这本书结构清晰,前面是叙述,后面是评论,具备典型的叙论相间的特征。

## 二、叙论相间中的“知人论世”与“感情的批评主义”

除此之外,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沿袭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在结构上叙论时特别重视传主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背景、政治条件等。在《孔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写了“没

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以及“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来交代孔子所处的家庭背景和政治环境。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在导言里就写了“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也在导论里写到了“异国的精神教养”。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为下面章节的展开进行了铺垫。在《韩愈》中，我们可以把第二章的“籍贯和先世”视为对韩愈所处的家庭环境的交代。在《陶渊明论传》中，李长之在“序”里的“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和“陶渊明所受两方面的影响”也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这种结构上的批评方式也纳入了李长之独具特色的“感情的批评主义”，即“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sup>[6]</sup>由此，就对批评主体的才气与学识都提出了要求。批评家所需的才气是灼见和审美能力。凭着灼见他迅速地由第一印象抓到作品的核心，凭着审美能力，他马上尝出作品的高下。天才还须学识与理想的附着。批评家须有人生理想、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要有哲学训练、美学训练、社会科学的知识与伦理学的知识，有了这些丰厚坚固的知识储备，他才可以飞跃他的幻想力，以深刻的对创作家施以敬意的理解，完成求真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韩愈》一书中，几乎通篇都是描述韩愈如何在专制政体中进退挣扎的。再来看屈原，李长之在1936年写了《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窥测》和1941年写了《孔子与屈原》。李长之前一篇文章中对屈原作品真伪的考证方法，与历代研究屈原的学者很不相同，他主要不是通过屈原作品中涉及的地名、人名、时间、事件等内容推测此篇是否屈原作品；他是看作品的精神气质与他认定的屈原精神是否一致来“窥测”屈原作品的真伪，适当地结合参考了陆侃如等学者的考据。应当说，这一方法的主观性很强，客观性、科学性则相对较弱，但这一方法若作为一证屈原作品真伪的辅助手段则是有效的。但李长之关注的问题还不是他对屈原的考证可靠与否，是否逼真地画出了屈原的肖像，而是他认定的屈原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他为何认定此种精神是屈原的？我们可以从李长之对屈原的阐释中看

出作者的心情。在此文导言中，李长之动情地写道：

我无时不在想批评——其实是理解，或者毋宁说是礼赞——屈原的作品的，因为，当我们越多生活一天，越多在人与群的关涉里呼吸一天，越多熟悉于这衰老的短浅，油滑，世故而个人利害那样分明的同胞们的生活方式一天，我们便越觉得在那里是有一人：他是全然和周围窒塞人生命的空气相反，他是以一人之勇，而敢于和这作激烈的冲突。他是终于牺牲掉在这些贪生怕死的庸劣卑怯之徒所视为最宝贵的生命，而决不后悔或疑虑，只为的是保全自己那高洁，坚贞，远大和悠久的信念之尊严，这是多么令我们应该带了惊异的目光去看看的呢，这人是屈原，他有超乎世界上任何珍贵的东西遗留给我们了，这便是他的作品。我常觉得，我们不能冷冷地把他的名字混入我们所记得的平淡的古代的人名录之中，他的作品，我们也不应该使之无声无息的只压在宋版的、明版的，铅印或石印的飘飘的纸篇之下，正如我方才所说的，我们应该惊异，是的，惊异！这才是恰切的字！

这段文字可以看做是此文的眼。1936年，在李长之眼里，屈原是因为不见容于污浊的尘世，为保全自己的信念与尊严而自沉的，这种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在此异常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一为信念与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就是李长之认定的浪漫精神。他是以此为坐标来判断《楚辞》中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一精神的，由此判断屈原作品的真伪。比如《惜往日》，他认为与屈原其他作品比较，此篇“情绪不对”，不是屈原作品，原因之一是“屈原是勇敢的，是强的，他的入世色彩是浓烈的，他的撒手而去正是示威的，正是不屈的”，他是“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此态也即奴才之态。但在《惜往日》的作者手里则“十分卑怯，成了一个弱者”。比如《渔父》，他认为也不是屈原的作品，因为该文文义是“赞成圆活的是老庄式的滑头的‘和光同尘’的灰色人生，正可以和屈原精神作一个对照”。再如《大招》、《招魂》要活，他认为也不是屈原所作，因为“屈原要死，而《大招》、《招魂》要活，大不同就在此”。“在《大招》里一切是乐观的，一切是美满的……完全是歌功颂德了，屈原能出诸口吗？”因此，李长之认为《大招》

是“宫廷文学”。《招魂》用意和《大招》差不多，他认为是宋玉所作。宋玉是同情屈原的，“然而同情和了解，并不碍于精神的相违，屈原是不得于现世的，所以另一世界的鬼怪皆可怕，皆可仇，明白这种根本的不同，便不会把《招魂》派给屈原了……”可见，屈原正应和了李长之对个体人格完善的期盼。

目前对李长之的研究并不多。大陆虽也有学者设专章讨论他，比如王富仁对他的《鲁迅批判》的评价、温儒敏对他传记批评家的身份定位、黄健对他“京派”批评家的地位认同，但他们并没有把李长之最为独特的传记体批评特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忽略了李长之传记批评的价值。

当前虽然有论及李长之传记批评的文章，但都没有谈其文体特色。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将李长之的批评表示为传记批评，但是仅仅是从作品的风格与人格的层面来讨论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张蕴艳在《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中也谈到了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但更多的也是停留在人格、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来解读。

另外，对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传记的研究，只是出现过相对而言为数不多的全面研究和大量的短篇随笔及论文。因此，以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为研究对象，结合传记文学理论，这也是对研究

传记文学的一种补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在关注李长之的批评文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李长之.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1.
- [2] 李长之. 韩愈 [M]. 胜利出版社, 1944.
- [3] 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M]. 开明书局, 1948.
- [4] 李长之. 陶渊明传论 [M]. 棠棣出版社, 1953.
- [5] 李长之. 孔子的故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 [6]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7] 周海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8] 张蕴艳. 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9]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艾伦·谢尔斯顿. 传记 [M]. 李文辉, 尚伟,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3.
- [11] [美]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 文学理论 [M]. 刘向愚,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12] 郜元宝, 李书. 李长之批评文集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